

常乃憲著

歷史哲學



論叢

商務印書館印行



3 0647 0588 6

601.4078

596

2

歷

史

哲

學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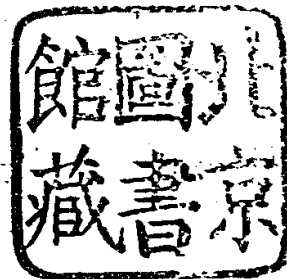
叢

崇乃匯著

商務印書館印行



513376



目序

本編係輯歷年發表有關歷史文化問題的十幾篇文字而成，編輯的次序係依論文的性質而非依發表年代的
前後，因為各文發表的時間頗不相同，相去有將近七年以上的，所以內容措辭頗欠一致。此書的編輯全由友人
黃君欣周一手完成，關於材料的搜集，編排的形式，以及內容字句的修校，黃君曾費過幾個月的工作，一絲不
苟，這是我應該特別提出來致謝的。

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作者序於成都。



目錄

自序

一	歷史與哲學·····	一
二	歷史與歷史學觀念的改造·····	五
三	史觀的意義及其可能性·····	一三
四	歷史的本質及其構成的程序·····	二二
五	歷史的重演問題·····	二七
六	關於思想·····	三六
七	歷史文化之有機的發展·····	四三
八	人生的悲劇與國際的悲劇·····	七〇
九	文化與國家·····	八一
十	中華民族在世界中的地位與其前途·····	九二
十一	中華民族怎樣生存到現在·····	一〇三
十二	日本民族的人格分析·····	一一三

歷史哲學論叢

一 歷史與哲學

(民國三十年十月三十日晚在華大哲學歷史系學會成立會講辭)

剛才羅院長和諸位談到，國內各大學中以哲學與歷史合成一系者，當以本校爲首，兄弟對於各大學情況不甚明瞭，想來當係事實。

從來哲學家專尙空談，而歷史家特重記憶。哲學家的言論，要字字皆自我心中流出，不許鈔人隻字半句；歷史家的撰述，要句句都有來歷，不許杜撰一絲半毫。這樣看來，歷史與哲學兩家不但不是一對老搭擋，並且還像一對生死冤家，無怪乎人們一聽到哲學和歷史會構成一系，要大驚小怪了。

但是哲學與歷史又確確實實是一對頂老的老搭擋，很像電影裏的勞萊與哈台。以何爲證，我們中國的第一位大哲學家老子，曾做過周朝的柱下史，這就是頂好的證明。哲學是思辨之學，但是憑空構想的思辨，不如從客觀的事實材料中去發展思辨，所得結論較爲踏實，所以一個好的哲學家決不應該忽略歷史；歷史是記述之學，但是一味從故紙堆中去鑽取材料，而不加一點思攷的作用，這樣的歷史，也難免玩物喪志之譏，所以一個好的歷史家也決不能沒有他的哲學。哲學而離開歷史，好像孤魂野鬼，歷史而離開哲學，便是行屍走肉，只有哲學和歷史合作起來，才能構成一個活靈活現的人生。現在中國的歷史界，仍舊爲清代考索學派的風氣所籠罩，以爲歷史家的任務祇是在故紙堆中鑽來鑽去，結果辛苦一生，得到的不過是一團渣滓，有何意義？現在中國的哲學界，我不大明白，也許根本中國還沒有產生一個哲學家，所有的不過是些哲學大綱，哲學概論式的

編纂者和一些偽撰史實歪曲真相的史觀派。這都是哲學和歷史沒有真正合作的緣故。

我今天下午在歷史哲學班上曾講到司馬遷的歷史哲學，這位中國唯一的第一流大歷史家，就是最懂得這個道理的。司馬遷的史記在中國過去學術界曾備受崇拜，但是推尊他的，不是賞鑒他的文辭，便是誇讚他的史料，還有些莫明其妙的攷據家，認為史記的記述自相抵觸之處甚多，頗欠正確，照他們的看法，還不如班固的漢書。其實太史公根本就不是在寫歷史，他是在寫他的哲學，他著史記的動機是想：

「究天人之故，達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他的書原來不叫「史記」，而叫「太史公書」，正和莊子、孟子、淮南子、呂氏春秋等書同一體例。如果僅從記述的眼光去看史記，當然會找出許多毛病的了。

但是太史公為什麼不學老莊孟荀一樣，自己著一部空談的書，發揮自己的哲學思想呢？這就是他所以過人之處。他也曾說過：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孔夫子一生也沒有著過書，刪詩書、訂禮樂，都是就舊書的文獻去加以整理，論語是弟子們記載的，只有春秋雖是根據舊史舊聞，却是他老先生重新編定的。他編春秋，是著述，不是記錄。是創造，不是鈔襲，是要發揮微言大義，不是單為魯國做起居注。所以是哲學，而不僅是歷史。太史公的史記，正是做春秋此物此志而作。

明白了這個，才知道為什麼史記在中國歷史著述中佔獨一無二的位置，不但遠非班固、范曄之流所敢望，就是司馬溫公的資治通鑑也遜之甚遠。因為這些人的著作只是鈔胥式的斷爛朝報，而太史公的史記却是一部「究天人之故，達古今之變」的「一家言」。

因此，我希望諸位要努力以我們中國第一位大史學家司馬遷為模範，學歷史的時候，不要只管死記事實，只管背年表，一個好的歷史家決不是祇會背年表就算完事，必須要加上點哲學的思攷作用。一部好的歷史著作

裏面必然是有點哲學意味的，一個好的歷史必然有他自己的哲學，否則就絕不會寫成一部好的東西；反之諸位學哲學的時候，也要懂得一點歷史事實。一個哲學家的思想必須要建立在客觀現實的基礎上，若是不問現實，一味閉眼瞎說，那樣的哲學是空中樓閣的哲學，一與現實碰到就會倒塌的。

但是有了這兩種精神——哲學的與歷史的——還不夠，還須要更進一步。希臘人釋哲學是「愛智之學」，西洋文化的精神就在「愛智」兩字，他們的學者畢生所追求的是「理智的探險」。希臘時代是如此，現代精神也依然是如此，這種精神固然可貴，也有很大的效果，但是不善用之，却也流弊甚多。即如現今世界大戰中種種殺人利器的使用，毒害學說的流傳，無一不是由於過分發展理智而與「人生」脫了節之故。至於專門發展理智的結果，把學問越分越細，把人越變越專門，越機械，弄得天下祇有「專才」，而無「通才」。祇有枝枝節節的瑣屑研究，而無體用兼備的「通人」，也是現代西洋文化的流弊。在這兩點上我們中國古人的論學宗旨便比較高明。揚子法言說：

「通天地人為儒」。

可見一個標準的學者必須要兼通天地人，決不可一味「見其偏而不見其全」；張橫渠先生說得更好，他的教學宗旨是：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請看這是何等氣象！豈是現今一般以記誦研考為學的人所能夢見的。諸位既學哲學，又學歷史，這兩種學問都是教人「通天地人」的。如果再把橫渠先生的為學宗旨，牢牢記在心裏，立志取法乎上，則雖不能為聖賢，也足以於備成一個「四體不動，五穀不分」的高等流氓。

諸位，請看這是何等氣象！豈是現今一般以記誦研考為學的人所能夢見的。諸位既學哲學，又學歷史，這兩種學問都是教人「通天地人」的。如果再把橫渠先生的為學宗旨，牢牢記在心裏，立志取法乎上，則雖不能為聖賢，也足以於備成一個「四體不動，五穀不分」的高等流氓。

家社會樞紐的全體之學，諸位的出路是自己可以開創的，因此出路之大莫有過於諸位之所學者。諸位應該知道，創造宇宙和人間的是甚麼人，只有哲學家、歷史家、現今世界各國沒有一個沒有他的「立國指導原理」，而立國指導原理之堅固與否就全繫於其歷史和哲學的根據正確與否而判。現在指導世界動向，「嗚風雲」的人物，如羅斯福、斯大林、邱吉爾之流，那一個不是大哲學家、歷史家，不過他們的哲學是要見諸行事而非僅託諸空言，他們的歷史傑作是用行動寫出而非用筆墨寫出罷了。諸位要做一個好的歷史哲學家麼？以這些人做榜樣罷！



二 歷史與歷史學觀念的改造

一 歷史與歷史學

中國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於歷史觀念的民族。中國歷史著述及文獻的豐富在世界各地民族中也要數一數二，但是因為中國人的民族性偏重實際而不長於理論之故，歷史著述雖然發達而史學並不發達。近來一般關於史學史或史學通論的書，對於歷史和歷史之學兩者的區別多分不清楚，因此往往把某一個歷史著述發達的時代就稱之為史學發達的時代。這種說法不啻把事實和理論混為一談，譬如植物學者把植物本身就當作植物學，如果過去某一時代中植物甚為繁茂，我們就可以說道時代的植物學甚為發達，豈非笑談。但是現今中國一般關於史學的著作却往往沿襲此種錯誤而不自知。即如梁任公先生說：「中國於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為最發達，史學在世界上各國中惟中國最為發達。」又說：「晉代為吾國史學最發達之時代」，這都是誤把歷史著述當史學了。又如一個歷史家生平對於歷史曾著述多種，一般人也就尊之為「史學家」，這都是沒有懂得「學」字的本意的緣故。

一種學術必有其研究的對象，這個對象便是本學問要研究的事實，如同天文學以天文事實為對象，生物學以生物事實為對象之類。單純地記錄天文的現象不得謂為天文學，單純地記錄生物的現象也不得謂為生物學，所謂學者，必須對此事實現象加以理解，加以吟味，加以研究，甚或組成一個系統，這樣才能稱之為學。否則便是單純地訴之於記憶而不訴之於理解，在理不得稱之為「學」。

一切科學以至哲學對於這個區別向來就很清楚，科學史家或哲學史家從沒有把科學的對象或哲學的對象當作科學哲學的本身，獨至於歷史學便常犯此錯誤，不但中國人如此，即西洋人關於史學的著述也常有此誤，何

以科學的標準來歷史和其他學術所研究的對象有一個根本不同之點，其他學術所研究的對象都是屬於空間的，而歷史則其屬於時間的，因此一切科學的對象都可以成爲歷史，如同天文現象史，地質史，生物史之類；而各種科學本身也可以成爲歷史，如同天文學史、地質學史、生物學史、哲學史、社會科學史之類，而史學當然也稱史學史。歷史既然是時間的東西，所以不能按照空間的平面排列去研究，只能按照時間的先後連續去研究，因此研究歷史的時候也必須像歷史著述一樣把歷史著述或歷史本身按其時間的連續次第先後系列起來去加以理解，這樣的方法便是歷史的方法。歷史學者去研究歷史時還不得不採用歷史的方法，這就是容易把歷史和歷史學兩個概念混淆不清的緣故。

第一種混淆其學術研究的對象有一大部分都是現在的，擺在眼前的，或並沒有時間性的（如哲學所研究的問題）。至於過去只要用一部分工作即行，所以不至把研究的對象和學術本身混淆。歷史學所研究的歷史則全屬於過去的東西，必須用歷史的方法才能把他們聯繫起來，因此歷史學者要研究歷史必須先作一番歷史編纂的工作，這也是一種預備工作，一種史學的敲門磚，但王夫用得太多了，便易把預備工作當作正式工作，把手段當作目的，把敲門磚當作本身。這是歷史學和歷史兩個概念所以混淆不清的第二個原因。

我們現在如果專談史學，就必須把過去關於史學觀念的錯誤糾正過來。我們絕對不可把歷史著述當作史學，這一個學者生平關於歷史的撰述無論如何豐富，這個人只能叫做歷史家而不能叫做史學家。

此外還有三種與歷史有關的學問也不能叫做史學。

第一種是史論或史事批評。中國自孔子作春秋欲以正名分，別善惡，使亂臣賊子懼以後，開了史事批評一派，春秋三傳解經之說，就是這一派的始祖。唐宋以後，此風大盛，差不多每一個文人的集中總有許多論史的文章，有就善惡是非來立論的，也有就利害成敗來立論的。這一派人不過是對於歷史上的個別事件加以主觀的評論，他們雖然可以說是史學的先導，猶如鍊金術之爲化學的先導一樣，但還不夠稱爲史學。這一派是伴教訓時代的歷史而發生的，他們誤把價值判斷當作史學，而不知史學之本義不應如此。

第二種是歷史考證。史論之學盛於宋明，因為當時也正是程朱陸王理學極盛的時代，到清朝以後，學者厭棄理學的空疏而改趨考證訓詁，歷史家也受了這種影響而趨於考訂事實，搜求文獻一派，正如西洋文藝復興以後的文獻主義學者一樣。自近代科學的歷史發達以後，大家誤以為考訂史料就算盡了史學的能事，所以越把工夫用到這一方面去。殊不知歷史考訂的工夫無論做得怎樣深，充其量不過是對於史料的搜集鑑別上有一點點勞，祇能叫做史術，還不夠稱為史學。

第三種是歷史方法，這一派的大師自當以劉知幾為首，他的史通一書就專論做史的方法，後人推之為史學之祖。其實這仍然是一種「史術」而非「史學」。如果史通可以叫做史學，則一切歷史研究方法，歷史編纂法，歷史教學法等類著述都可以叫作史學了。這一派和第二派一樣，他們所研究的不過是歷史著述的本身，而非歷史的本身。我們必須將「歷史材料」，「歷史著述」，「歷史」，和「歷史學」這幾個概念分辨清楚，才能了解史學的正當意義。

然則如何才能稱為史學呢？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必須對於歷史這一件整個的事實加上點理解作用，才能叫做史學，單純的記錄工作不能叫做史學。

照這個標準看起來，只有上述的史論一派還有點史學的意味，其餘三種都不過是記錄之學，是史學的預備工具而非即史學本身。至於史論一派雖有些微理解作用，但屬於價值判斷者多，屬於理法探討者少，即有少數論及因果法則的也都是枝枝節節的議論，很少能夠成爲一個整個系統的，所以祇能說是史學的原始形態，還不能就配稱為真正的史學。

中國歷史家中懂得史學的意義的恐怕只有司馬遷一人，他的史記是「欲以究天人之故，通古今之變」的一家言，所以他的史記並不是單純的專實記錄，而是和儒道墨法諸家著作同等的系統哲學，不過他不用抽象的玄想而用實際的事實材料來建築他的一家之學，比周秦諸子更進步，可惜後來的歷史家無人能夠懂得他的意思，所以儘管出了許多模倣的正史，別史，而却沒有一種配得上稱為一家言的。

在歐洲方面，歷史哲學較為發達，自奧古士丁（Augustine）著上帝之城以來，就已建築了歷史哲學的基礎。晚近各派歷史哲學紛紛並起，什麼唯理史觀，經濟史觀，地理史觀，生物史觀，文化史觀等各成一家，史學到此才算真正進化到「學」字的階段了。

不過我以為歷史哲學雖可以算是「史學」，但不能說是「史學」的最進步形態。因為這些學說都不過是把歷史當作一個客觀的對象而研究其理法形態，他們心目中的歷史是一個擺在人對面的死東西，人可以用解剖兔腦一樣的態度去解剖歷史，這還不能算是把握了歷史的真意義。

歷史是活的，不是死的，他的本身就是一種有機的構造，我們不能用解剖學的方法去研究歷史，也不能用建築學的方法去研究歷史，我們必須用歷史的方法，從歷史本身的發展次第形態去研究，才能真正把握了歷史的意義。

所以，一個真正的歷史學，必然須用歷史的眼光去追溯一個歷史的歷史。

二 過去歷史演進的三階段

歷史本身是一種有機的生命，歷史不是人造的，歷史不是歷史家寫出的，一切生命的本質是自己生長。歷史也有生長。

過去歷史的生長大約經過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是順序出現的，在另一意義看來，我們也可以把他們當作是一祖相傳的三兄弟。

這三兄弟中第一個出世的就是傳奇化的歷史，也可以說是藝術化的歷史。這時代的歷史觀念以求美為主，因此充滿了浪漫化的矜奇誇大色彩。歷史之源本出於文學，而文學之源則出於宗教，希臘時代司文藝的七神之一，就有歷史之神 *Clio*；在中國，文史兩家的界限常是分不清，許多著名的歷史家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范曄、歐陽修之流，同時也就是著名的文學家，上古時代的歷史如國語、左傳、戰國策，以及後來的史

記，吳越春秋，越絕書之流，都含有很多的浪漫氣分，與穆天子傳，山海經等小說相差並不甚遠。這些書之所以能永垂不朽，就因為他們這種傳奇的作風。西洋方面也是如此。希臘的歷史託源於荷馬（Homer）的史詩，其中文學和神話的意味遠過於歷史。後來如希羅多德（Herodotus）的史記，以及羅馬布魯他奇（Plutarch）的英雄傳，也是同時具有歷史和文藝價值的作品。希臘末年的歷史著作更特別受修辭學的影響，專門注重求美。在歐洲以外的白色人種之中，如猶太人的舊約，阿剌伯人的天方夜談，印度人的史詩和吠陀經典，也都是歷史的而兼文藝的，同時又是宗教的。

現在所謂科學的歷史家盡量鄙視這種藝術化的歷史傾向，認為邪魔外道，然而我們如果能平心靜氣去考察一下他們在當時的社會價值，以及後來對於一般讀者的印象和魔力，就可以曉得這一派的著作不是輕易可以一筆抹殺的。

繼傳奇化的歷史而出現的第二個兄弟，就是教訓化的歷史，也可以說是倫理化的歷史，這是人類社會從宗教時代演化到倫理時代的產物。這時代的歷史觀念以求善為主，充滿了教訓的說理色彩。在中國，這一派的著作起源於孔子的春秋，到宋明理學時代，大為發達，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和朱熹的通鑑綱目，可為此派的代表。在歐洲，如希臘末期的波里比阿（Polybius），羅馬的李維（Livy），都是此派的代表。基督教統治歐洲以後，歷史著作更充滿教訓的氣味，大神學家奧古士丁的上帝之城，開闢了哲學的先聲，但其本質仍是教訓的。

這一派的歷史，現在也為科學的歷史家所屏棄，認為主觀成分太多，但我們如果能夠仔細把歷史學的概念探討一下，就可以知道單以主觀二字來抹殺這一派的價值，也是不很公允的。

三兄弟中最後出現的當然就是考證化的歷史，也就是一般科學化的史家所認為合乎科學標準的歷史。這一派的精神是求真，因此既反對浪漫矜奇，又反對勸善懲惡，他們的目的是要把歷史做成一個死板板毫不動主觀感情的照相機，歷史的本相是什麼，就給他照出個什麼樣子來，科學的歷史家心嚮往之的歷史就是這一

派。

在歐洲，古代歷史著作之中雖有幾種合乎這種標準的，但嚴格說起來還不夠，真正的考證工作是從文藝復興時代的文獻主義者（Humanist 舊譯作人文主義者）開始的。他們拚命搜求希臘羅馬時代的文獻，隻詞片字，奉為珍寶，在這種風氣之下，非旁徵博引考據確然者，不能稱為歷史，於是歷史家和鈔書家合而為一。在中國，所謂漢學考據家也走的是同樣的路。近代所謂科學化的歷史，雖然考證的範圍比文藝復興時代的學者廣博得多了，他們已不復以紙上的考證為滿足，更費精神於考古學，人類學，比較言語學等方面，期於發現歷史的真面目和全面目。

這一派的功績是不可抹殺的，他們的努力精神也很可欽佩，然而我總不以為這樣就算是盡了歷史的能事。科學的歷史家所奉為不刊的格言是「努力排斥主觀的成見，以純粹客觀的態度去搜求歷史的真相」。他們似乎以為歷史是擺在歷史家對面的一個世界裏，我們可以忘記自身去觀察他，如同我們觀察一個行星的軌道一樣。但是事實上能否辦到如此的絕對客觀的地步呢？從相對論發現以來，我們已經知道即使是天文學上的觀察，也不能脫離了觀察者的地位而另有所謂絕對超然的不變標準，何況由複雜人事所構成的而歷史家本身即屬於其中一分子的歷史呢？我們可以引現代德國歷史家福利德爾（H. Friedell）對於科學的歷史所下的評語來答覆這個問題：

「考證（原譯作援引）式的歷史，當他努力想成科學之頃，他已不是客觀的了；當他努力想成客觀之頃，他已不是科學的了。」——王孝魚譯：現代文化史上卷第九頁。

三 歷史觀念的改造

中國文化思想界現在剛開始與科學接觸，大家浮慕科學，然而却又不真了解科學。一般對於科學的認識仍是從十九世紀的舊式科學觀念中得來的，他們不知道二十世紀的科學觀點已有了重大的轉變。

歷史學者之接受科學觀念更是較近的事，所以對於科學新觀之了解更爲茫然。一般以爲科學的歷史就是考證式的歷史，就是努力搜集些乾枯材料累積起來的工作，他們的理想標準是把歷史表冊化，令人打開一看除了乾枯無味的人名地名及數字之外再沒有別的東西了，他們以爲能做到這個程度才算盡了科學化歷史的能事。然而這種標準總是很難做到滿意的，即使做到了也沒有多少人喜歡看，更談不到什麼影響，所以他們不得已而思其次，只好以考證工作滿足自己，一個鈔得最多的歷史家，便是最好的史學家。

這種風氣一半固由於受了西洋文藝復興以後所謂科學的歷史派的影響，另一半也還是清代漢學的遺風。漢學家鄙視一切理想，專重考據，他們談哲學要考據，做詩文也要考據，寫歷史更非考據不可。

在這種中西合璧的歷史考證派風氣之下，一般歷史學生把聰明才力用對牛角尖裏去，他們可以爲一件瑣細到極點的不相干問題費上數萬字的考證工夫，換得一個博學的頭銜。現在一般歷史雜誌上多半充滿了這一類的材料，在西洋也是如此，假使程子復生，不罵他們一聲「玩物喪志」才怪。

我們現在想勸這些科學的歷史家不要把聰明心力白費到這些地方，更不要貽誤後代的青年，效力是很小的。因爲他們根本迷信一個科學，我們以爲只有他們所慣用的方法才是絕對科學的方法。我們現在要糾正這種迷誤，只有另行提出一種更廣大更新穎的科學見解，根據這種見解來建立真正歷史科學的理論系統和治學方法，才能使一般學歷史的人覺悟所謂科學化的歷史決不是表冊式的歷史，也不是鈔書式的歷史和化石展覽式的歷史，真正科學的歷史家，也決不屏棄主觀的成分，決不鄙棄藝術化和倫理化對於歷史著述的影響。這種工作成熟以後，才能使後代學歷史的學生，展開了他們廣大的眼界，不至於一死地鑽向牛角尖裏去。

我們要提出的方法主要的是採用發生學的態度，把整個歷史的構造進程，從原始事實起，經過種種演化的階段，以至變成了我們眼前所見的歷史爲止，一層一層剖析起來。只有用這個方法，才能使一般歷史學生知道一部歷史是怎樣構成的，其中含有多少主觀的成分。

這種方法是科學的，所得的結果也是科學的。

如果科學的歷史家肯平心靜氣把歷史的構造過程分析一下，至少可以發見歷史的構造過程應當分作四個階段，即是：（1）原始的事實，（2）由事實變為史料，（3）由史料整理為史實（4）由史實組織成歷史。這四種階段顯然是各不相同，考證的歷史所努力的不過是發見史料，然而史料祇是史料，決非即事實的本身，也非即歷史的全部。史料不過是原始事實留存到現在的片段化石，如同原人所殘存的骨骼頭顱一樣，不能即認為足以代表原始事實的全部。史料是死的，原始事實是活動的，所以無論所得史料如何豐富，決不能從史料的排比上就能看出原始事實的真相。要將零碎的史料排比成史實乃至歷史，必須加上點選擇組織的作用，而這些作用便是新加上去的，所以新組織成的歷史，其中所含的精神不但不能從零碎的史料中求得出來，也未必與原始事實真正相符，因為他已經是一件新產品了。所以西洋有一位學者說：「凡是歷史都是現在的」。

考證的歷史家，因為不懂得「事實」，「史料」，「史實」，和「歷史」這四個概念中間的嚴重區別，他們辛苦一生，搜集了無數的史料，便以為可以由此發現歷史事實的真相了，其實，他們不過發現了許多片段的史料，事實的真相永遠不會看到，等他們將這些史料排比成一部像樣的歷史的時候，他已經不是發現過去的事實真相，而是創造了他自己以及他的時代和民族的哲學了。

三 史觀的意義及其可能性

「史觀」是甚麼？史觀就是我們人類對於過去自己所作成的歷史的一種系統的理解。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史觀，不必是歷史哲學家才會有的。大多數人所持的史觀，是由一種不求甚解的混俗和光態度中產生出來的，就是祇管依照一般的世俗見解去人云亦云，而不作一番系統的思考。譬如社會上說人類生而平等的，多數的人也就跟着說人生而平等，而並不去仔細考察考察人果然生而平等或否？社會上說和平是人類最高的道德，多數的人也就跟着說和平果然是人類最高的道德，而並不去仔細考察和平果有道德上最高的價值與否。多數的人們所以如此不求甚解，因為他們以為這些問題是本來應該如此的，用不着去再加考慮，他們從小的時候在父母師長指導下就習慣了如此的觀念，長大之後社會環境又告訴他們人人都是如此觀念，因此他們覺得這些觀念是應該本來如此的，就再不感到有重新思考的必要了。有些思想家更從而辯護之，創造出什麼「理性」的學說，說人的先天自具有判斷是非的理性，可以不學而知，「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於是對於一切問題更用不着去深考了。從生物史觀的立場看來，大多數人這種習焉不察的庸俗史觀，自有其社會的價值。因為若是人人都想矜奇立異，每一個人都要創造一種與眾不同的史觀，則社會失去公認的標準，集團組織難免因之解體，而這個社會也就隨生存競爭的淘汰力量而落伍或滅亡了。所以大多數人持有一種不求甚解的混俗和光的史觀，乃是為社會生存所必要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社會也要求對於自己的過去歷史加以智慧的考慮。因為社會要求生存，就不得不時時自動地加以改革，以求適應於本身日新不已的生長過程，和四圍變化多端的环境。凡是思想，生活一切趨於僵化的社會，往往因為不能適應這些新需要而也陷於落伍或滅亡。特別是智力發展到高階段的社會，更應以自己的智慧來指導或統治自己的生活，因之史觀的需要遂應之而起。不過像生物個體的有機結構一樣，社會集團也有